

慧琳音义研究

徐时仪 著

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

序一

“在语言学的三大部门里，从中国古代语言学发展史看，词汇学创始得最早，可是后来并没有发扬光大”（罗常培语）；“科学的词汇学的产生是比较晚的”（周祖谟语）。不难看到，我国词汇学是一门既古老而又年轻的学科。由于词汇研究自身因素的局限和后人思想认识的局限，汉语词汇和词汇史的研究，长时期以来重先秦和现代两头而轻中间，中古词汇研究显得相当薄弱。

汉语事实表明：中古时期，书面语发生了文言与白话的差异。民族的融合，佛教的传入，对中国社会各个方面都发生深刻影响；佛典汉译采用当时口语词汇以利佛教传播，僧人著述的力求通俗易懂解，这在相当程度上反映了当时语言实际面貌。佛典汉译中引用大量外来词语，外来词语也随着佛教传播渗入到汉族社会各个领域，成为汉语词汇有机组成部分。这些都相应地促进了汉语词汇的发展。徐时仪同志有鉴于此，慎选具有代表性的专著《慧琳音义》进行研究，并借以多方透视，全面生发，意义重大，学术价值甚高。

徐时仪同志驰骋古文献领域，长于考据训诂之学，基础坚实，功力深厚，驱以正确指导思想和学科方法，借鉴现代语言学原理，从佛典、传记、类书、笔记中搜罗掌握第一手资料，深入开掘，全面研讨，攻坚不懈，用力极勤，先后发表论文 50 余篇，并在此基础上，成《慧琳音义研究》一书。此书展示《慧琳音义》原来面目和汉语词汇网络，多发前贤时秀所未发，间正方家之失误，一新学界耳目，良多创获，堪称填补空白之力作。它的问世，也体现了学科的继承与创新的辩证统一，为中古词汇和词汇史的研究提供了理据和可靠

语料,同时也丰富了我国文化学、文献学、民俗学、语言学之宝库。

本书是当前研究《慧琳音义》最全面深刻的好书,自是无容置疑。然任何学术都有发展补正之余地,本书当亦无例外;苟有美中不足之处,固无伤大体,未可苛求。

徐时仪同志时方盛年,奇逸卓犖,治学严谨,成绩斐然,今喜读佳作,特为之序。

许威汉

一九九七年金秋

序二

对于《慧琳音义》的研究，前贤虽不乏精采之作，但往往只是边缘性质的探讨，尚未触及核心的价值。

汉语的发展，唐宋是转换点，前此是中古汉语，后此是近古汉语。而中古汉语又可按蒲立本的意见分为早期和晚期中古汉语。前者以《切韵》为代表，反映六世纪前后金陵、洛下的书音系统。后者以慧琳之作为代表，反映唐代标准语的变迁。唐定都长安后，以洛阳为东都，武后驻蹕洛阳长达数十年。两都漕运、驿道相通，居民往来频繁，两地方言趋同。李涪谓“中华音切，莫过东都”，可见当时的标准语还是洛阳话。这时的洛阳话与长安话同为标准语，而《切韵》时代则与金陵话同为标准语，两者相差甚大，故李涪对《切韵》有“吴音乖舛”之讥，慧琳对《切韵》一类字书也有“吴楚之音”的指责。《慧琳音义》正处于中古汉语从早期到晚期的转换点上，所以其价值首先是由时代决定的。

汉语各大方言，大体在唐宋之间定形。一般都认为，各方言的文读系统与中古音之间有较严格的对应关系。不过严格说来，与方言文读系统对应的是晚期中古汉语，而不是早期中古汉语。日本的汉音、汉越语也都借自晚期中古汉语。因为《切韵》在中国音韵史上的权威性，研究中古音的人都言必《切韵》。但从现代各方言的流变着眼，对晚期中古汉语的研究就更有意义。如南方许多方言中，真韵往往分两类，真韵重组三等喉牙音与欣文韵合为一类，与重组四等读音不同。这种现象与《切韵》不合，而与《慧琳音义》分类相同。所以《慧琳音义》的价值又由研究汉语方言史的需要所决定。

传统的中国学术界，搜集材料有务求赅博的倾向，但往往忽视了材料内部的同质性。如《切韵》的异读数以千计，有些异读来自不同的韵书或方言，与陆法言用来审音的金陵、洛下书音并不相同。这种非同质性的材料混在一起，又不作来源的说明，就给科学的分析造成很大的困难。但慧琳的读音系统就没有这么混乱，他并不受传统韵书的约束，而以长安的实际读音作为审音标准，不符合标准音的读音就舍弃不取。有些人批评慧琳的反切太混乱，同一个读音有几个不同的切语，但这正说明慧琳是完全根据实际的读音和反切规则自造切语。只要读音不错，反切规则严格，其读音系统就会做到内部一致。如果考虑到《慧琳音义》与《切韵》之间的历史关系，在《切韵》如此多的异读中确定标准音，慧琳的读音就是一个很好的核准材料，所以其价值又由其自身的编写方式所决定。

中国历史上文语与口语的分离，使实际口语中出现的许多词语不能及时地在文语中反映出来。释家讲经传道，首先要考虑到如何使信徒都能听得懂，所以他们必然会大量地运用口语，而且进一步反映在佛子经论之中。《慧琳音义》把经论中的这些词语都一一罗列出来，这对于汉语词汇史的研究弥足珍贵。

对于汉语史的研究来说，唐代的《经典释文》和《慧琳音义》可说是瑰宝中之瑰宝。由前者可以探索汉语上古形态的奥秘，由后者可以梳理汉语向近代发展的脉络。但是这两块瑰宝都埋藏得极深，需要许多人花费毕生的精力才能挖掘其核心价值。徐时仪同志的这本著作，对《慧琳音义》的成书年代、版本源流、内容概貌和学术价值等作了十分精到的考订和介绍，功力之深，治学之严，给人以很深的印象。此书为发端之作，后续必有宏制，我们翘首以盼徐君新的探讨和研究，徐君勉之哉！

潘悟云

1997年于语言所

目 录

序一·····	许威汉(1)
序二·····	潘悟云(1)
前言·····	(1)
第一章 《慧琳音义》编纂的时代背景·····	(3)
第一节 佛教的兴盛和传播·····	(3)
第二节 统治者的扶植和推崇·····	(4)
第三节 儒释合流的总趋势·····	(5)
第四节 释读佛经词语的社会需要·····	(6)
第五节 开放的文化政策和辞书自身发展的规律·····	(8)
第二章 《慧琳音义》的成书与版本源流·····	(10)
第一节 《慧琳音义》成书年代考·····	(10)
第二节 《慧琳音义》在宋元的流传·····	(11)
第三节 《慧琳音义》传入高丽和日本的年代考·····	(13)
第四节 《慧琳音义》失而复得的年代考·····	(16)
第三章 慧琳的生平考述·····	(18)
第一节 生卒年考·····	(18)
第二节 家世与出家·····	(19)
第三节 学识与思想·····	(20)
第四节 师承交游考·····	(24)
第五节 孜孜不倦,修缉为务·····	(26)

第四章 慧琳的语言文字观和辞书编纂思想	(28)
第一节 明于六书音韵之学	(28)
第二节 重视语言的规范	(32)
第三节 兼顾从俗从时	(36)
第四节 词义概括与义项分合	(40)
第五节 解疑释惑,主张实用	(43)
第六节 严谨求实,言而有据	(46)
第五章 《慧琳音义》的概貌	(50)
第一节 编纂宗旨和读者对象	(50)
第二节 集大成的规模	(51)
第三节 编排的方法	(52)
第四节 性质与类型	(54)
第五节 收词的原则	(56)
第六节 释文体例	(58)
第六章 《慧琳音义》的特色	(68)
第一节 大量收录复音词	(68)
第二节 广征博引,以今释古	(71)
第三节 正字辨形,标明六书	(73)
第四节 明于通假,标明正字	(75)
第五节 互见法的采用	(78)
第六节 功能众多,一书多用	(80)
一、专书百科辞典的功能	(80)
二、外来词词典的功能	(83)
三、双语词典的功能	(89)
四、字典和词典的融合	(91)
第七章 《慧琳音义》与旧有辞书的传承比较	(95)
第一节 《说文解字》的引用参证	(95)
第二节 《慧琳音义》与《经典释文》	(99)

第三节 《慧琳音义》与《玄应音义》·····	(101)
第四节 《慧琳音义》与《韵英》·····	(108)
第八章 《慧琳音义》在学术上的价值·····	(112)
第一节 语言研究·····	(113)
一、音韵·····	(113)
二、文字·····	(115)
三、佛教词语·····	(122)
四、近代汉语词汇·····	(124)
第二节 古籍整理研究·····	(133)
一、辑隋唐前佚书之一大渊海·····	(133)
二、考定现存古籍残本的真伪·····	(134)
三、提供注释古籍的佐证·····	(135)
四、考定校补现存古籍·····	(140)
第三节 辞书学研究·····	(145)
一、唐代新兴的韵书《韵英》和《考声切韵》·····	(146)
二、最早以“字典”命名的《字典》·····	(147)
三、《字统》与《字说》的传承渊源·····	(148)
四、辞书释义·····	(150)
第四节 文化史研究·····	(160)
第五节 《慧琳音义》的影响与不足之处·····	(162)
后记·····	(166)

前 言

《慧琳音义》^①是我国唐代一部集诸家训释佛经音义大成的佛典文献,也是我国辞书史上一部堪与《尔雅》、《说文》并列的古辞书。《慧琳音义》从一千三百部佛经中收词释义,训解四万多字,较为系统地保存了汉译佛典中从东汉到唐代的汉语口语材料和大量的外来词,在一定程度上如实反映了上古汉语和近代汉语两相交叉的中间状态,体现了汉语词汇古今演变的概貌。《慧琳音义》中引用了大量唐代尚存的文献资料来阐释佛典词语,这些文献资料中有很多今已失传,有的甚至连史志目录都未著录。其虽“义附彼教,而训释华言,采获所及,莫非古训”,^②且摭拾甚广,包孕弥富。^③其隶事运古,又信手挥霍,犹陶朱、猗顿之滥用金布,所存古义和佚书为数颇多,学者无不叹其诚小学之渊薮,艺林之鸿宝。其浩博无涯,洵足以俯视李善《文选》注和陆德明《经典释文》。故“此书出遂觉段茂堂、王怀祖、任子田、沈匏庐诸先生之撰述皆有不全不备之憾。”^④近人有从中辑佚的,有引作考证的,经史疑义求之注疏而不得其解者,辄于是书采获佐证,豁然明晰。然此书广博犹如深山大海,非三五人渔猎可尽,不仅爬罗剔抉,张皇幽眇,尚为未竟之功,

① 慧琳《一切经音义》又称《大藏音义》(见《宋高僧传》卷五),简称《慧琳音义》。本书用简称,采用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年影印鄯谷白莲社藏版《正续一切经音义》本。

② 见陆宗达《一切经音义引用书索引跋》。

③ 参见黎养正《重校一切经音义序》,载频伽精舍影印本卷首。

④ 参见杨守敬《日本访书志》卷四。

而且对慧琳其人其书亦尚欠全面深入的探究,未能触及其实核心价值之所在。

诸如慧琳卒于元和十二年还是十五年?《慧琳音义》成书于元和二年还是五年?何时刻印?何时佚于宋而存于高丽国?日本国请得是书是在明神宗时还是在英宗时?清代从日本访得此书是在光绪初年还是在宣统元年?《慧琳音义》是否悉依《开元释教录》所载佛经次序编排?其释音是依据《韵英》和《考声切韵》还是依据当时的实际语音?《考声切韵》是否就是《考声》和《切韵》?学术界说法不一,或采用旧说,或存疑示阙,或因陈误说,或考之失当。至于慧琳的身世交游和学识思想,《慧琳音义》的编纂指导思想、体例和特色,《慧琳音义》与前代已有辞书的渊源传承以及其在语言研究、古籍整理研究、辞书学研究和文化史研究上的学术价值等等,凡此种种,皆少有人具体论及。本书拟以《慧琳音义》所述和有关佛典、传记、类书、笔记等史料记载为依据,就慧琳和他的《一切经音义》作一些考证和研究,冀图弥补有关这部文献瑰宝的研究之阙。

第一章 《慧琳音义》编纂的时代背景

第一节 佛教的兴盛和传播

佛教自东汉由印度经西域传入中国以后,经过魏晋南北朝至隋唐而达到其全盛时期。唐初“四海廓清,三宝云构”,“度僧立寺,广事弘持。”^①太宗时有寺三千七百十六座;^②高宗时有寺四千座,僧六万余人;^③玄宗时有寺五千三百五十八座,僧七万五千五百二十四人,尼五万零五百七十六人。^④开元时令天下三岁一造僧籍,故其时有关史料所载僧尼人数当较可信,其时已有“十分天下之财而佛有七八”^⑤的说法。

唐代的都城长安,不仅是当时政治、经济、文化的中心,也成为中国佛教各宗并盛的重地。四方佛徒跋山涉水来到这里译经弘教,一时僧尼溢于三辅,寺塔遍于京城,“当时几乎把国内所有第一流的思想家都集中到佛学界里来”。^⑥阿弥陀佛只要人念他的名号即可往生西方“极乐世界”;观世音菩萨能闻声救苦,念他的名号就能水火不伤,超脱苦难;维摩诘居士不必出家当和尚即可“现身说

① 见道宣《大唐内典录》卷五《唐朝传译佛经录》第十八,大正藏卷五十五。

② 见《续高僧传》卷五。

③ 见《法苑珠林》卷一百。

④ 见《新唐书·百官志》和《唐六典》卷四。

⑤ 见《新唐书·辛替否传》,中华书局版。

⑥ 见苏渊雷《论佛学在中国的演变及其对社会文化各方面的深刻影响》,载《华东师大学报》1983年第4期。

法”；《金刚经》只要传诵一“偈”，就有“无量功德”。“几百年之中，上至帝王公卿，学士文人，下至愚夫愚妇，都受这新来宗教的震荡与蛊惑，风气所趋，佛教遂征服了全中国。”^①佛教的盛行，上起帝王，下到民间，都有极大的影响，已不单是宗教问题，而且是现实的政治问题、社会问题，对于当时的学术思想、文化生活无不产生极大的影响。^②

第二节 统治者的扶持和推崇

唐代儒释道并重。据《旧唐书·陆德明传》载唐高祖曾亲临释奠，“时徐文远讲《孝经》；沙门惠乘讲《波若经》；道士刘进喜讲《老子》”。唐代统治者对佛教基本上采取了扶持的态度。贞观二十二年（648）太宗曾召玄奘法师赴宫，玄奘为其所译《瑜伽师地论》请序，太宗欣然允诺，亲为撰写《大唐三藏圣教序》，并命上官仪对群僚读之。^③玄宗则不仅为《孝经》作注，还为《金刚般若经》作注。^④元和十三年（818），宪宗甚至至于“迎佛骨于凤翔”。^⑤

唐高祖李渊出身北周贵族，利用隋末天下大乱的时机，在太原起兵，打败群雄，登上了皇帝的宝座。唐初的统治者总结隋亡的前车之鉴，深感受要保持并巩固自己的统治，就得对老百姓在政治、经济等方面让点步。唐太宗曾对大臣们说：“甲兵武备，诚不可阙，然炀帝甲兵岂不足耶？卒亡天下，若公等尽力使百姓安义，此乃朕之甲兵也。”^⑥佛教适应中国的国情，从小乘到大乘，一直发展到禅宗，佛国入门券越卖越便宜，麻醉性越来越大。它反复宣扬当前的痛苦算不了什么，佛国就在眼前，这对封建统治者是有利的。佛教

① 见胡适《佛教的翻译文学》，载《翻译论集》。

② 参见《魏书·释老志》。

③ 见《大唐慈恩法师传》卷六。

④ 见《新唐书·艺文志》。

⑤ 见《新唐书·宪宗本纪》。

⑥ 见《通鉴》卷一百九十三。

还讲什么涅槃佛性、成佛作祖、乐园净土，这对统治者也是有吸引力的。唐李节《钱潭州疏言禅师诣太原求藏经诗序》说：“俗既病矣，人既愁矣，不有释氏使安其分，勇者将奋而思斗，知者将静而思谋，则阡陌之人皆纷纷而群起矣！”这段话一语中的地说明了统治者推崇扶持佛教的根本用意所在。统治者利用佛教，佛教则借助王权宏扬教义。据刘宾客《嘉话录》载德宗降诞日，内殿三教讲论，以僧监虚对韦渠牟，以许孟容对赵需，以僧罩延对道士郗惟素。诸人皆谈毕，监虚曰：“臣请奏事：‘玄元皇帝我唐天下，文宣王古今之圣人，释迦如来西方之圣人，陛下是南赡部州之圣人。’”《慧琳音义》卷首首释唐太宗所撰《大唐三藏圣教序》和高宗《述三藏记》，亦颇可说明佛教对王权的依赖。^①佛教发展至唐代，在统治者的扶持和推崇下，已与儒、道鼎足而三。

第三节 儒释合流的总趋势

任何一种外来文化，都要在同本国情况相适应的气候条件下，才能得以植根、生长、演化。佛教能在中国传播和发展，并成为中国上层建筑的有机组成部分，也经历了适应中国国情，不断地中国化的过程，中国思想发展史证明，儒释关系在漫长的历史长河中经历了一个曲折复杂的演变过程。有时斗争，有时融合，然而总趋势是佛教逐渐中国化，走向儒释合流。南北朝时期一些佛教徒已有意识地牵强附会儒释二家的观点，力主两者之同。隋唐时期，随着国家的重新统一，出现了许多中国化的佛教宗派，儒释进一步合流，隋李士谦把三教比做：“佛，日也；道，月也；儒，五星也。”^②唐初法琳在《辩正论》中称释迦牟尼是一个大孝子。华严宗五祖宗密（780—

^① 此序是唐太宗为玄奘所译《瑜伽师地论》而作，大正藏所收《大般若波罗蜜多经》前无此序。

^② 见元释念常《佛祖历代通载》卷十；参任继愈《唐宋以后的三教合一思潮》，载《世界宗教研究》1984年第1期。

841)《原人论》亦称:“佛且类世五常之教,令持五戒。”并在《孟兰盆经疏序》中宣扬孝道是“儒释皆宗之”。唐朝中后期,一些宣扬孝道的佛经也开始出现,强调孝是成佛的根本。这些都表明,佛教大师为了在中国发展传教事业,不断修改佛经教义来适应儒家的封建伦理道德。

实际上,把梵文佛经译成汉语和用汉语来释经意的本身就是一种佛教的中国化和儒释合流。道宣《玄应音义序》就已指出:“然则必也正名,孔君之贻诰,随俗言晤;释父之流慈,非相无以引心,非声无以通解。”智光《龙龕手镜序》也指出:“矧复释氏之教演于印度,译布支那,转梵从唐,虽匪差于性相,披教悟理,而必正于名言。名言不正,则性相之义差;性相之义差,则修断之路阻矣。故祇园高士探学海洪源,准的先儒,导引后进,挥以宝烛,启以随函。”黄子高《一切经音义跋》指出:“顾西域有音声而无文字,必藉华言以传,随义立名,固不得不借儒术以自释。唐代浮屠多通经史,又去古未远,授受皆有师承。”^①庄圻《一切经音义序》亦指出:“世俗之所谓三教者,道家则去儒不远,老子、文子亦或通乎治法。释氏有音无字,非借吾儒诂训,无以阐扬其教,故有唐沙门类多通晓儒术。”佛经在翻译过程中,已经迈出了中国化和儒释合流的第一步,即“藉华言以传”和“借儒术以自释”。

第四节 释读佛经词语的社会需要

我国的佛经翻译,从东汉桓帝末年安世高译经开始,至唐代臻于极盛阶段。据智升《开元释教录》记载,经、律、论三藏已共列1076部,5048卷,成为我国古典文献的重要组成部分。

语言是社会的产物,东汉初期,佛家词语已见于当时的皇家公文。《后汉书·光武十王传》载,汉明帝在给楚王英的诏书中说:“楚

^① 载《学海堂初集》卷七。

王诵黄老之微言，尚浮屠之仁祠，洁斋三月，与神为誓，何嫌何疑，当有悔吝？其还赎，以助伊蒲塞桑门之盛饌”。四十一个字中就用了“浮屠”、“伊蒲塞”、“桑门”等几个佛家词语。

从东汉到唐末的八百年间，随着大量梵文佛经的译成汉文，数以千计的佛家词语进入到汉语词汇中。梁启超《翻译文学与佛典》云译经者“或缀华语而别赋新义，如‘真如’、‘光明’、‘法界’、‘众生’、‘因缘’、‘果报’等；或存梵音而变为熟语，如‘涅槃’、‘般若’、‘瑜伽’、‘禅那’、‘刹那’、‘由旬’等。其见于《一切经音义》、《翻译名义集》者即各以千计。近日本人所编《佛教大辞典》，所收乃至三万五千余语。此诸语者非他，实汉晋迄唐八百年间诸师所创造，加入吾国语系统中而变为新成分者也。”佛经词语见于历朝正史者，如《魏书·释老志》、《隋书·经籍志》中之舍利、般涅槃、阿育王、须陀洹、斯陀含等，不下数百条。见于宋齐梁陈隋各书及南北史者，尤指不可胜屈。许多文人学士常在作品中引用佛经词语，见于历代所传之别集者甚夥。除涅槃、般若、菩提、夜叉、袈裟、刹那、地狱、天堂、无量、方便、圆通、不可思议、不二法门、五体投地等词外，其中也有一些本是汉语，佛经采用后，词义有了变化，如“本师”见于《史记·乐毅传》；“祖师”见于《汉书·丁姬传》；“居士”见于《礼记》及《韩非子》、《魏志·管宁传》；“侍者”见于《国语》及《汉书》；“眷属”见于《史记·樊噲传》；“长老”见《汉书》；“布施”见《国语》；“供养”见《嵇中散集》；“烦恼”见河上公《老子注》；“印可”见《论语》皇侃疏等。

语文词典是社会需要的产物。只有当社会发展到一定阶段，有了一定的文化积累，当两种不同的语言发生接触，需要用一种语言来诠释另一种语言中的难词难句，或者当一种语言的古代文献已经不再易于为一般人所理解，需要用现代语言去诠释古代文献中的难词难句的时候，才会产生一种社会需要，要求编纂旨在解释这些难词难句的词典。

佛经不仅义理博杂，名相浩繁，而且汉梵交错，字义多变。丁福

保《佛学大辞典》自序三说：“佛经者，其旨微，其趣深，其事溥，其寄托也远。苟欲明其真实义者，必以通其词为始。”人们不仅诵读佛经时需要有解释佛经文字的辞书，而且在读到一般典籍中的佛教词语时也需要有解释佛经词语的辞书可供查检。辞书的产生、发展和社会的需要密切相关，跟解决社会文化生活的变化所提出的实际任务有着活生生的联系，《慧琳音义》实际上就是一部适应社会需要而编纂的辞书。^①

第五节 开放的文化政策和辞书自身发展的规律

唐代统治者起自西陲，历事周隋，不唯政制多袭前代之旧，一切文物亦复不问华夷，兼收并蓄，采取开放政策。道宣《玄应音义》序称：“玄应以贞观末历，敕召参传，综经正纬，资为实录，因译寻阅，据拾藏经，为之音义。”《佛祖统记》载：“河中府沙门慧琳撰《一切经音义》一百三卷，诣阙进上，敕入大藏，赐紫衣缣币茶药。”两部音义，一为奉敕撰著，一为进上受赐，可见唐统治者兼容并蓄的文化政策和对编纂佛经音义类辞书的鼓励。

辞书作为文化产品，也和其他文化产品一样，既受一定社会条件制约，反映一定时期的社会状况，同时亦有其自身发展的规律。由于佛经翻译的影响，魏晋以来学者或利用反切为汉字记音，分析声韵结构，或辨析四声八病，探讨文学语言，因而产生了一些解释字的读音和意义的训诂著作，在传统小学著作中独成一类。这些训释专著为音义注释类辞书的问世奠定了学术和材料的基础，于是产生了为研读儒家著作、佛经经文、道家典籍服务的专书辞典。成书于陈后主到唐武德年间（583～618）的《经典释文》博采汉魏、六朝以来二百三十余种著作中关于《周易》、《尚书》、《庄子》等十四种经书文字的音切和训诂，汇为一书，是我国第一部为儒道典籍注音

^① 参见胡明扬《词典学概论》。

释义的专书辞典，^①也可以说是汉魏以来群经音义的总汇。

唐代是我国历史上兴旺发达的强盛时期，无论在政治经济上，还是在学术文化上都承前代而有所创新发展。唐代重视文献的积累，据《旧唐书·经籍志》载，开元盛时四部诸书凡三千六十部，五万一千八百五十二卷。其外，释道经论凡二千五百余部，九千五百卷。在中国辞书史上，唐代也是一个建设开创时期。根据现有史料记载，当时已有各种辞书近百种。唐代重视语言文字的规范化，太宗曾颁布颜师古的“五经定本”，作为天下士人读书的依据；其后以规范字体为宗旨的字样之学因而大兴，出现了一批整理异体、辨别俗讹、订正经典中文字，专讲“字样”的辞书。如颜师古的《字样》、颜玄孙的《干禄字书》等；其时继隋诸葛颖《桂苑珠丛》一百卷后，又编纂了几部大型辞书，如大圣天后《字海》一百卷和颜真卿《韵海镜源》三百六十卷等；^②出现了根据唐时言语所作的韵书，如《韵英》、《韵铨》、《考声切韵》。^③音义之作继《经典释文》后在唐代亦颇盛一时，史崇、崔湜、沈佺期等撰有《一切道经音义》130卷，^④慧琳则囊括玄应、慧苑等人的音义作《慧琳音义》，成为佛经音义的总汇。这类集众家字书之长而注释经典文字音义的专书辞典在唐代蔚为大观的局面，正是辞书自身发展规律的必然，从而在一定程度上满足了读者的需要，成为我国辞书史上“创新的划时代的著作”，^⑤《慧琳音义》就是现存这类辞典中规模最大的一部。

① 见《陆德明〈经典释文〉》，载《辞书研究》1986年第3期。据《大唐内典录》和《开元释教录》著录，北齐沙门道慧著有《一切经音》，今已佚。陆德明撰《经典释文》时抑或见到此书。今无以考证其书内容及体例，故以《经典释文》为第一部专书辞典。

② 见《旧唐书·经籍志》和《新唐书·艺文志》。

③ 参见王国维《天宝韵英、陈廷坚韵英、张戢考声切韵、武玄之韵诠分部考》。

④ 见《全唐文》卷九百二十三史崇《妙门由起序》。

⑤ 见刘叶秋《中国字典史略》。